

# 中方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宣布 单方面撤军的原因探究

郑华 程雅青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方在取得了战场上绝对优势和胜利的情况下,突然做出单方面宣布停火和立即撤军的决定。这一决定令世界震惊,也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环境等方面对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 中印边界冲突;单方面撤军;中国;印度

西方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谈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写到:“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未作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文中所说的“重大胜利”即指被中方称之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方称之为瓦弄战役的1962年中印两国由于边界争端在藏南地区和阿克赛钦展开的军事较量。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但中方军队却并没有就此收复本属于中国的领土,而是于1962年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于12月1日,主动后撤,于1963年3月1日从“麦克马洪

线”继续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的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外,做出了单方面宣布停火和立刻撤军的决定,与印军脱离接触。

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学者在中印边界冲突研究问题上分歧重重,对中方在边界冲突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宣布单方面撤军的原因也更是缺乏系统的解答。为此,本文将依据解密档案,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等维度探究中方主动宣布单方面撤军的原因。

学界现存研究成果曾就撤军原因做过不同的解释。印度学者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以印度为受害者身份进行战争过程研究和客观对中印边界历史、争端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两种,对于中国无条件撤军原因主要持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印度尼赫

---

作者简介:郑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雅青,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国防部发言人关于我边防部队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的声明》,1962年13期至15期。

此类印度学者的代表作可参考:Margaret W. Fisher, *Himalaya Battle Ground: 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 New York: Praeger, 1963;多萝茜·伍德曼(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New York: Praeger, 1969;P·C·查克拉瓦蒂(P.C. Chakravarti), *Indian-China Relations*, Calcutta: Firma K.L. Mukhopadaya, 1961;帕什塔·梅赫拉(Parshotam Mehra), *The Mac Mahon Line and After*, Delhi: The Macmillan Press, 1962等。

此类印度学者的代表作可参考: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unakar Gupta), *The Hidden History of Sino-Indian Frontier*, Calcutta: Minerva Zsociates, Pvt. Ltd, 1971等。

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为代表,认为中方在战争中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在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选择撤军。狄伯杰认为中国政治目的之一是为向美苏及世界表明新中国仍具备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其二则是为了稳定西藏,一方面向达赖表明不能寄希望于印度进行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对印度支持达赖分裂中国这一行为进行警告。因此在迅速取胜达到政治目的后,选择撤军。第二种观点则是从两国军事实力对比的角度展开分析,比姆·桑德(Bhim Sandhu)认为在美苏对印度进行包括军事援助等多方面援助的情况下,战争一旦陷入长期对峙,在后勤保障供应、国民爱国情绪动员等方面将对印度更加有利,因而,中方选择单方面撤军,避免陷入长期作战。

中方学者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研究起步较晚,最初多将中印边界冲突放置西藏议题,或中印关系中进行研究。自九十年代以来,始有旅美华人学者刘学成依据解密档案对中印边界争端的产生进行详尽的研究,研究呈更为细化、深入态势,如:依据军方档案,从军事行动层面对中印边界冲突实录的分析;对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角色进行分析研究;对中国国内环境和对外政策之关联的研究;对印度“前进政策”及尼赫鲁大思想对于战争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从危机处理角度、边界功能、博弈论等视角重新审视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过程,并探讨其影响和教训等等。但涉及到中方单方面宣布撤军的原因探究,上

述文献均未能对撤军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为此,本文将依据中美解密档案,对中方单方面撤军原因进行探究。

### 一、中国外交政策考量

自1956年中国经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新疆至西藏的公路开始修筑后,印度政府就逐步向阿克赛钦地区及中印边界的中段、东段派驻军队。对印度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坚持释放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早在1959年5月毛泽东就强调:“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sup>①</sup>直至1962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完中印边界冲突情况汇报后,对中方方针的定位依然是:“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后退,避免流血’。”<sup>②</sup>由此可见,在外交议题的排序层面,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

B.R.Deepak, *India and China 1904-2004*, New Delhi: Manak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5, pp.255-266.

Bhim Sandhu, *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8, p.75.

杨素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

耕砚:“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南亚研究》1981年。

X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 Relations*, Ann Arbor, Mich.: UMI,1994.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蔡佳禾:《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王琛:《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郑华、张振洋:《美苏冷战视角下的中印边界冲突原因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9期。

代泽华:《印度的“前进政策”与中印边界战争——一种认知理论的视角》,《理论界》2011年第5期。

邱美荣:《边界功能视角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刘会军:《威慑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南亚研究》2011年第9期。

①《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2页。

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非印度,因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有利于中国战略资源的合理分配。

在印度后期坚持以武力推行“前进政策”,严重侵犯中方领土主权的情况下,中方开始被迫进行军事反击。对于此次反击战的定位,正如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作出的最后决策:“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由此可见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即使发展到了武装冲突,中方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克制和忍让,坚持以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印期间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来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问题,避免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主动休战、后撤仅是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众多友好步骤中的一个。

## 二、国际环境对撤军影响

毛主席在中印边境冲突战前军事会议曾说:“中印开战,美苏自不必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印度一边,我们是有点孤立了。”由此可见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的国际环境。

### 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态度

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出现,冷战逐渐从欧洲扩展到远东。这一时期,“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加入西方冷战阵营,成为在亚洲遏制中苏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成为英美等大国

在南亚的战略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即通过对印实施经济和军事援助、改变对“麦克马洪线”的政策、在印巴关系中进行斡旋等策略,希望改善美印关系。1958年达赖喇嘛外逃及朗久流血冲突发生后,中印关系恶化,美国政府即更加注重加强印美关系。196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代号为NSC6105的关于南亚政策的文件,明确指出需要抵制共产主义对南亚各国的渗透,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促使南亚国家对自由世界阵营的接受。其中对于印度的利益即应当保持印度的独立性,使其处于一个中立的、非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导之下。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在麦克马洪线的归属问题中通过发表“一条传统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国际边界,美国完全支持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正式表明立场,另一方面积极斡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企图帮助印度减轻在西线的压力。与此同时,对印度进行经济及军事相关援助。与英国成立联合工作组,向印度提供有关中国军事的情报信息,与北约成员组成“亚洲军事发展态势委员会”,并给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协助空运自动化武器及弹药,帮助印度建立并部署军队,以保持强大的军事设备对抗中国军队的进攻。

### 2. 中苏同盟关系逆转后的苏联态度

1955年苏联逐渐改变对第三世界中立国家的态度,并开始通过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立场等方式,与印度交好,利用印度在亚非国家中的威信扩大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却开始动摇。

1958年夏天毛泽东公开在党内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提出批评,之后长波电台、中苏联合舰队的建设、台海危机事件中中方对苏联建议的不信任、苏联领导人和官方舆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均逐渐使原本便存在于中苏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暴露出来。

资料显示,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以低价

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of: India; Pakistan; Afghanistan; Ceylon; Nepal. Memo. TOP SECRET.* Jan 19, 1961.

Document 18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October 26, 1962. *FRUS, 1961-1963, South Asia.* p.351.

Document 220: 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Posts, Washington, December 8, 1962. *FRUS, 1961-1963, South Asia.* pp.426-427.

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9期。

卖给印度八架运输机,并于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尽管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苏联由于身陷古巴导弹危机,希望得到中国支持,因此表明出了对中方的支持。但由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中国并没有按照苏方要求来表达支持,只是公开表示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中苏间隔阂进一步加深。因此,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缓和,苏联在11月14日对印出售包括当时最为先进的米格21型战斗机在内的武器,恢复对印军售。其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立场逐渐明确,希望利用印度对中国进行制衡的战略也逐渐展现出来。

### 3. 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态度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周恩来总理积极主动地采取外交行动,在一周内即向几内亚、古巴等数十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通报了中印边界情况,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希望通过努力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冲突的真实情况,为中国争取支持。尽管如此,亚洲国家中仅有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和越南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大部分亚洲国家则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印度;中东地区国家则几乎一边倒地完全支持印度;甚至连非洲国家中大多数也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仅有为数不多的如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加纳等国支持中国。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较为艰难,一方面需要面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又受到苏联集团的敌视,与此同时,还受到来自很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因此中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主动撤军所展现出来的风范,有利于改变外界认为中国在进行对外侵略的观点,摆脱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处境。

## 三、中国国内环境对撤军影响

### 1. 经济环境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中央政府在农业方面实施极端政策的原因,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遭受到了较大打击。与

此同时,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一时期要求中国偿还债务,并单方面废除中苏两国签署的各项协议,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因此客观上,中国需要尽快结束冲突,避免陷入需消耗大量资金和资源的持久战。

### 2. 政治环境

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迁台后一直宣扬“反攻大陆”的口号,希望反攻被中国共产党占领的中国大陆。1961年,在大陆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灾情严重,社会较为动荡时,蒋介石判断1966年前后数年,应是台湾反攻大陆的适当时期,于是下令实施“国光作战计划”。对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计划在1962年分两批抽调陆军和空军36个师又30个团进驻福建。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也是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部署和监控的地方,为了集中精力,维护国家统一,中国也应及时从中印边界冲突中抽身,寻求最优解决途径。

## 四、中国客观后勤保障问题及军事力量对比

### 1. 客观气候地形等因素致中方后勤保障困难

中印边界冲突的战斗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雨雪集中,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从气候上分析,中方在10月下旬开展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如战线继续延长,则易遇到冬季大雪。

中方在西藏边境作战的装备给养包括石油制品均来自上千公里外的四川等内陆地区,无论是从内地进藏的公路还是进藏后通向中印战场的公路,大多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如遇到雪季,则公路随时面临封闭的可能,中方军用物资运输线难以得到持久保障。与此同时,通过车辆进行物资运输的成本较高。根据资料记载,由于距离长,路况较差,运输损耗高,每运抵西藏两车油,就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这对于这一时期经济较为困难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但是仅仅靠(下转第21页)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542页。

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参考1962年11月13日-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解密外交档案。

魏碧海:《雄狮搏鸡 阴法唐将军访谈录》《军事历史》2005年第2期。

孔德生:《中印边界闪击战述要》《党史博采》2002年第9期。

房功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再辨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了国内各政党各阶层和解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在国内战争中敌人可能少一些。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苏维埃政权对立面除了白卫军还有不少农民,特别是在国内战争的后期,农民起义蜂起,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失误所致。那时是把所有拥有余粮或粮食,在黑市(当时没有合法的市场)进行粮食交易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在政党和阶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树敌过多。尽管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过高,正因为如

此,在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同时,布党不但不能庆功,反而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出现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党内争论这种空前困难的局面。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措施,它得到国内多数居民的赞同。但是列宁多党制设想只停留在提纲上,没有在俄国得到实施。以后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不仅只有一党统治,而且党内也禁止有不同的意见,更谈不上存在不同的派别,苏联终于从一党专政演变成一个领袖专政。

(上接第80页)

牦牛和老百姓双脚维系的后勤支援却又无法满足战争最前线的物资供应。因此,中方应在取得胜利后进行撤军,避免在雪季进行全面作战。

## 2. 客观军事力量对比

在中方面临较严峻的后勤保障问题,参战人员消耗较大,缺少经过长期训练适合高原作战环境的部队,且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时,印度方面则在1954年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不断增兵,修筑了边境公路、兵营和机场,不仅地形上拥有南亚平原更有利于修建物资运输的公路网,在装备上也有苏联出售的先进军事武器和装备,还有英美提供军火支援,在战场后方拥有较先进的重装部队。因此,经过已有战争消耗后,中方优势逐渐在减少。面对拥有美苏等国家军事、经济支援的印度,一旦陷入全面持久战,中方获胜几率将会降低。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后勤保障还是客观军事情况考虑,在易攻难守的情况下,中方主动撤军是较明智的选择。

## 五、撤军评价

中方在主动停火、后撤后,还将在战斗中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归还了战俘,并在1962年12月两次用友好的方式照会印度政府。这些举动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

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由此可见,单方面撤军这一举动,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使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逐步帮助中国重新树立国际威望,并打破美国南亚政策,扭转困顿不利的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上,中方有效威慑后及时撤军,有助于稳定西南边疆,集中精力对国内经济进行恢复和建设。

《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1962年11月21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1962年12月26日。